

文、法文或德文。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①学风趋于功利浮躁,必然影响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在近代中国商业化冲击和商业资本运作之下,学术商业化和功利化日趋严重,民国学界确实出现了不少思想肤浅、学术水平低下之作。潘光旦指出:“哲学家与教育家既倡之于前,著作家与出版家自必从而和之于后,自此非浅易之文不作,否则将无读众;非通俗之书不印行,否则将无买主,而读众与主顾之多寡,一视浅易之程度而差,诚以不如此不足以顺合潮流也。夫一端有浅率易与之读者,一端有惟利是图之出版界,而居其间者复有多数专恃稿费为生活之学问家与借稿费为补助之学生,从而扩大其供求;供求之间,一推一挽,而知识介绍事业乃若水之走坂,愈趋而愈下矣。”^②朱自清亦分析道:“从前人著述,非常谨慎。有许多大学者终生不敢著书,只写点札记就算了。印书不易,版权也不能卖钱,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们学问的良心关系最大……现在我们印书方便了,版权也能卖钱了,出书不能像旧时代那样谨严,怕倒是势所必至;但像近些年来这样滥,总不是正当的发展。早先坊间也有‘大全’‘指南’一类书,印行全为赚钱;但通常不将这些书看作正经玩意儿,所以流弊还少,现在的‘概论’‘大纲’‘小史’等等,却被青年当作学问的宝库,以为有了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无窒碍。这个流弊就大了,他们将永不知道学问为何物。”^③在知识产品商业化潮流下,民国学术研究出现肤浅化和庸俗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总之,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进行的专门化研究。学术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以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学术研究者逐渐成为职业学者,并被吸纳到现代大学、专门研究机构、新式学术团体、专业图书馆、科学实验室及学术期刊构成的现代学术体制之中。这套日趋完善的现代学术体制,为民国时期职业学者的生存发展及其学术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既然身处现代学术体制内的职业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要承担者,那么,体制内的学术研究便自然成为民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建制化的学术研究机构因而成为民国学术研究中心。作为传统学术研究中心之书院被现代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取代后,那些仍然创办书院及聚集于书院中从事学术研究者(如章太炎、唐文治、马一浮等)因未能进入现代大学及研究所等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中,难以被体制内主流学术所认同,故处于民国学界之边缘地位。由此可见,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和职业化不仅规范着民国学者的学术活动,而且制约着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双重路径

阎书钦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大使命。为此,应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虽然晚清学人对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有初步了解,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构建始于民国时期。这亦是学界利用本土资源,对西方学术潮流回应的结果,其进程表现为双重路径:一是科学观念普适化,各派学者在将科学观念普及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基于各自的学术理念,对科学观念提出不同的理解,尤其马克思主义学者运用唯物辩

① 蒋梦麟《和平与教育》,《教育杂志》第11卷第1期,1919年第1期。

② 潘光旦《近年来之知识介绍》,潘乃穆等编《潘光旦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③ 朱自清《论青年读书风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334页。

证法,全面深化了科学观念;二是社会科学中国化,学界在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引入中国的同时,又融会、创新西方范式,形成中国自身的研究范式,进而以引自西方和中国自创的研究范式研究中国问题。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换言之,社会科学中国化亦即民国学界以外来或自创的科学范式研究中国问题的过程。

一、科学观念普适化

民国学界科学理念盛行,存在明显泛科学化倾向,“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间的区隔并不明显,不仅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视作科学,亦将哲学、历史学等划入科学范畴。虽然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曾试图运用以人的心理和精神解释社会现象的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挑战科学的权威,但在民国学界并不占主流。而且,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科学的社会功用的质疑并不坚决,例如,在1923年科学与玄学论争中,张君勱等只是试图限制科学的适用范围,认为科学难以解释人的心理或精神现象,仍承认一部分社会现象的科学适用性。在民国学界看来,社会科学即以科学实证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他们注意到,西方科学实证方法源于自然科学,19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孔德(A. Comte)提出“社会物理学”概念,认为科学方法亦可用来研究社会现象,成为社会科学理念之缘起。

民国学界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作了大量探讨。诸论者深受欧美科学实证论影响,肯定社会现象存在因果关系与法则。1930年7月,胡一贯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表示,“研究社会现象的学问,既能成为科学,则社会现象之间,当然有法则的存在了。”^①1933年4月,杨幼炯在《社会科学发凡》一书中声称,“社会现象既是宇宙现象之一,当然是有一定的相当的规律可寻。”^②所以,大家强调,对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运用科学方法。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将科学观念泛化为普适性观念后,将科学方法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成为民国学界共识。1923年2月,张慰慈在《政治学大纲》一书中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由于西方运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十九世纪欧洲各国竟成了一个创造社会科学的时代。”^③孙本文于1935年1月在《社会学原理》一书中也表示,“凡自然现象、社会生活,一切发展的史迹与现状,无不可为科学的材料。”^④显然,民国学界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认识是以自然科学为标杆的。1928年7月,郭任远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主张,社会科学应“自然科学化”。^⑤陶孟和则于1930年3月在《社会科学是科学吗》一文中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同为“自然”的一部分,研究“人类或社会”亦应采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⑥人们之所以如此强调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亦缘于当时的社会需求。中国近代社会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形成的巨大社会转型和严重社会危机,需要以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解析中国社会问题。1934年3月,陈端志在《现代社会科学讲话》一书中即注意到,在中国各种意识形态相激荡的形势下,社会科学成为一种“救世法宝”。^⑦中国社会变革对社会科学的巨大需求促进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认知。

① 胡一贯《社会科学概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1930年版,第8页。

② 杨幼炯《社会科学发凡》,大东书局1933年版,第30—31页。

③ 张慰慈《政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0—21页。

④ 孙本文《社会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页。

⑤ 郭任远《社会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89—90页。

⑥ 陶孟和《社会科学是科学吗》,北平社会调查所编《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30年3月。

⑦ 陈端志《现代社会科学讲话》卷头语,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1—2页。

在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成为倡导科学观念的生力军。日益兴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既与同时期科学观念息息相关,又通过倡导唯物辩证法深化了科学观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则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臻于壮大,涌现出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论者和论著,被时人称作“新兴社会科学”或“新社会科学”。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的结果,亦与一些左翼论者的自发学术努力有关。致力于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论者大致包括三类人员:瞿秋白、萧楚女、杨剑秀、柯柏年、曹伯韩等中国共产党理论宣传工作者;高尔松、陈豹隐、沈志远、李平心等脱离中国共产党组织但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论者;邓初民、王亚南等虽未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论者。他们是科学观念与方法的积极倡导者。1926年11月,萧楚女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人事界亦可与自然界一样,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它的过去与现在,以推知它的未来。”^①杨剑秀于1929年6月在《社会科学概论》一书中问道:社会现象既然存在因果法则,“为什么[么]会不能成立为科学?”^②他们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主张基于唯物史观经济基础理论分析社会问题,构建起系统的革命式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亦在同时期中国学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或许是我们认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必然性的另一个视角。

如果作宏观考察,民国时期致力于构建社会科学理论的论者明显分为三大阵营。除上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派之外,还有学院派、国民党派。从20年代初开始,留学欧美的学者大量回国,形成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学者群体。例如,在社会学界,有陶孟和、孙本文、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杨开道、应成一、费孝通等;在政治学界,有张慰慈、陈之迈、浦薛凤、钱端升、萧公权、杭立武等。由于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派、学院派、国民党派论者阐述的社会科学范式存在多重歧异。这既表现在他们面临的西方各国学术的纷杂,亦表现在其对西方学术的取舍与创新的各异。在社会学分科问题上,学院派与国民党派论者以欧美分科为样板,强调社会学的基础地位;马克思主义论者则强调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核心的哲学的基础地位,质疑社会学的独立性,或将社会学等同于唯物史观。对于社会现象的因果法则,非马克思主义论者由社会现象复杂性和研究者主观性,强调社会现象因果法则比自然现象低弱和难以把握;马克思主义论者则指出,社会现象虽存在人的意志与行为,但其中蕴含的因果法则亦是客观的。各派论者虽一致主张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但非马克思主义论者多将科学方法理解为归纳法、演绎法等逻辑方法和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统计法等实证方法,而马克思主义论者则主张,科学方法除上述一般方法外,必须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

二、从引介西方范式到社会科学中国化

民国时期社会科学范式基本仍为西来。诸学者大多致力于向中国引介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美国社会学范式受到人们高度关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乌格朋(W. F. Ogburn)于1922年出版《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一书,将以鲍亚士(F. Boas)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应用于现代社会研究,创立美国文化社会学。美国社会行为分析理论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为重镇,代表者有

^① 萧楚女:《社会科学概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1926年版,第2页。

^② 杨剑秀:《社会科学概论》,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10页。

派克(R. E. Park)、蒲其斯(E. W. Burgess)、汤麦史(W. I. Thomas)等。他们摈弃以往注重研究人们内在心理的倾向,将研究重点置于人们外在行为。美国文化社会学和社会行为分析理论得到孙本文等留美归国学者的大力宣扬。以社会行为研究为基础,芝加哥大学学者又创立以都市社区研究为特色的人文区位学。他们将芝加哥城区划分为若干区域,结合不同区域的社会环境,考察不同区域人们行为的异同,从而发现不同区域的社会问题。吴景超作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将这种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20世纪初,美国学界构建起系统的社区研究方法。除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方法外,衣阿华州立学院教授何桑(H. B. Hawthorn)、密歇根州立学院教授白德菲(K. L. Butterfield)、威斯康星大学副教授葛尔宾(C. J. Galpin)等提出一系列农村社区研究方法。英国学者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和布朗(R. Brown)通过研究非洲、大洋洲初民社会,形成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吴文藻、杨开道、费孝通等燕京大学学者将美国社区理论和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引入中国。美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对民国学界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张慰慈于1923年2月出版的《政治学大纲》主要参考美国学者基特尔(R. G. Gettell)《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高一涵于1930年2月出版的《政治学纲要》不少内容参考美国学者高纳(J. W. Garner)《政治科学与政府》(*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在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上,诸学者接受西方理论,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形成科学国家学观念。为了说明国家问题,人们又重点介绍西方一元主权论和多元主权论。

民国学界对西方范式多持融会与创新态度,在此基础上,形成诸多自身范式。孙本文于1928年至1930年主编社会学丛书,又于1935年1月出版《社会学原理》,将美国文化社会学、社会行为分析理论熔于一炉,提出将社会行为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分析,构建起完整社会学理论体系。燕京大学学者将英国功能派文化人类学文化分析方法植于美国社区研究方法之中,形成颇具燕大特色的社区研究方法。吴景超将芝加哥大学都市社区研究方法与哈佛大学教授格来斯(N. S. B. Gras)在《经济史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阐述的都市经济构成理论相结合,于1937年2月出版《第四种国家的出路》,提出系统的工业化理论。邱致中于1934年6月出版《都市社会学原理》,借鉴美国学者安迪生(N. Anderson)、林德门(E. C. Lindeman)《都市社会学》(*Urban Sociology*),试图构建新的都市社会学理论。在政治学界,诸学者对西方理论亦不乏补正与创新。萧公权即指出英国学者拉斯基(H. J. Laski)多元主权论的内在矛盾,在《拉氏政治思想之背景》一文中申明,拉斯基既主张国家与其他社团共同拥有主权,又认为其他社团不可能挑战国家权威,两个观点相互矛盾。^①显然,民国学者在引介西方范式的同时,又对这些西来的范式进行融会贯通与补充,甚至提出批评,其中不乏创新之处。

学术中国化是民国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在人们看来,所谓学术中国化,既包括在融会西方范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更包括将引自西方和中国自创的学术范式应用于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研究。孙本文于1931年2月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二届年会上提出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既系统引介欧美重要社会学学说与方法,又以欧美社会学学理研究中国问题。^②1940年12月,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也提出,欲实现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须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

① 萧公权《拉氏政治思想之背景》附录一 杭立武《政治典范要义》,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6—67页。

② 孙本文《中国社会学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中国社会学社编《中国人口问题》,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8—19页。

相验证。^① 1927年10月,孙本文在《中国文化区域之研究》一文中倡导运用美国文化区域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区域。^② 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系统阐述以都市工业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成为30年代倡导中国工业化的领军者。费孝通等在全面抗战时期撰写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成为研究中国农村社区的代表性成果。在政治学界,陈之迈于1945年12月至1946年9月分三册出版的《中国政府》、萧公权于1945年12月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均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经典作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亦强调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1946年7月,邓初民在《新政治学大纲》一书中申明,马克思主义“新政治学”应成为中国革命人民“新的斗争武器”和“新的战术战略”。^③ 以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问题,充实了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研究,使民国学界初步实现了社会科学中国化。

综上所述,民国学界构建的社会科学理论强调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其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以唯物辩证法深化了此种科学观念,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是真正的科学理论。同时,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理论的构建存在由引介西方范式,到融会、创新西方范式,形成中国自身范式,再研究中国问题的发展过程。这亦是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过程。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不乏启示意义。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持开放心态,与世界整体研究全面接轨,更要结合中国情况,进行自身理论创新,还要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理论指导。

民国学术的清学传统

李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在民国时期人文学术的演进史上,中国古典学术一直充当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角色,特别是与民国距离最近的清代学术。甚至可以说,对于民国人文学术的建立和发展,清学实际起着奠基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清季民国学者非常重视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和总结上,体现在民国学术的学风与方法上,而且民国年间居史坛主导地位的新历史考证学实际也是继承和更新清学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清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中国古典学术演进至此,已是绚烂至极,在清代学者的进一步努力下,有了集大成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晚清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挟其船坚炮利之优势,把一个与中国固有文明截然相异的文明强行输入中国,西学借此大举进入,与中国古典学问相遭遇,双方相激相荡,相通相融,促使中国学术在面貌上发生了根本改变,无可选择地走上新途。这两种情形已然昭示,与其他时代相比,清代学术实具不可替代的关键地位,对其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研究,显然至关重要。

① 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文化论》(What Is Culture),费孝通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页。

② 孙本文《中国文化区域之研究》,孙本文《文化与社会》,东南书店1930年版,第31—36页。

③ 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自序,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1—2页。